

经济观察报

The Economic Observer

观察家文章精粹

改革思想录

《经济观察报》学者观点

秦晖 金雁 孙 陈志武
许小年 立 肖知兴 雷
张维迎 何帆 平 薛兆丰 顾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改革思想录

《经济观察报》学者观点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思想录:《经济观察报》学者观点/刘坚主编.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154-0354-0

I. ①改… II. ①刘…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文集 IV. ①F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8588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总策划 麒麟书社
责任编辑 宗边钟蓓
装帧设计 姚洁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网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80×1020 毫米 1/16
印张 14 印张 135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秦晖 金雁 孙 陈志武
许小年 立 肖知兴 雷
张维迎 何帆 平 薛兆丰 颐

目录

序 新知识阶层的使命	001
------------	-----

PART 1 社会	005
-----------	-----

肖知兴：我们这个时代的恶之花	006
----------------	-----

肖知兴：游戏的精神	010
-----------	-----

张维迎：语言腐败的危害	014
-------------	-----

孙立平：重建公信力关键在机制	019
----------------	-----

薛兆丰：管制造成的烦恼	023
-------------	-----

薛兆丰：收入如何分配？	027
-------------	-----

陈志武：收入差距为什么在恶化	031
----------------	-----

PART 2 回望	049
-----------	-----

秦晖：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	050
----------------------	-----

雷颐：以自由为本	073
----------	-----

- 084 秦晖：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 094 金雁：俄罗斯的“超国家”梦想
- III 何帆：美国大法官如何讲政治
- 118 金雁：国家机器上的“癌变”
- 138 秦晖：“彩虹”的启示
- 158 薛兆丰：行善的困难

- 164 孙立平：走出转型陷阱
- 175 孙立平：确立社会转型新思维
- 191 许小年：城镇化或城镇神话
- 199 薛兆丰：北京信不信市场
- 204 陈志武：公司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新知识阶层的使命

刘 坚 / 文

《经济观察报》2001年创刊时提出的办报理念为：“理性，建设性”。在我们看来，“理性、建设性”的核心是理解、尊重、未来导向和互相承认；主张以积极正向的心态看事物，以渐进、重过程、可持续并留有余地的技术方法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强调扩张性、非零和、用增量来解决存量问题的思维方式，最终实现目标群体的利益最大化。而作为本报核心板块的“观察家”，更是这一理念的积极实践者。

“观察家”的编辑们经常引述1947年储安平给胡适的约稿信中的一段话，作为“观察家”的编辑思路：“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嫌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居中的……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要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

鼓励我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

“观察家”关注中国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中的重大事件，重要思潮，致力于为制度变迁提供全球视角，为社会转型提供解决方案。深入新闻事件的核心，寻找问题事件和问题人物，专家学者将典型事件和人物纳入制度分析框架，学者和记者编辑们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与合作，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2006年底，《南方周末》年度致敬之年度专栏颁给了《经济观察报》的“观察家”版。《南方周末》在致敬理由中写道：一个社会是否有思想，只要看看这个社会里严肃媒体是否有思想就知道了。作为一家严肃媒体，《经济观察报》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该报的“观察家”版块，在一定意义上，“观察家”的思想深度，代表了中国严肃媒体的思想深度。

有学者在2002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曾以《联邦党人文集》为例，来说明那些本来发表在报章上浅白易读的篇章也许并不符合理论家的要求，但是，对于后来制度的发展却是影响深远的，被后世视作法学和政治学的经典，甚至这些本不以理论创造为追求的文章也具有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后来多少理论家靠它吃饭就足以证明它的理论内涵是多么的博大精深。在他看来，“在现在的中国，我们仍然需要有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们奔走呼号，使得我们这个老大中华的制度建设上轨道。”

2003年1月《经济观察报》曾策划出版“观察家丛书”第一辑：“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并提出重建公共知识分子传统，认为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他们不是过度传播新观念，而是对新观念浑然不觉。期望“观察家”的努力能激发知识阶层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积极参与。

十年后，“公知”已成公众名词，甚至被污名化。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也从报纸专栏作者变成了网络意见领袖，“观察家”再次结集成书的意义又何在呢？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知识人不只看事物的现状，而能看出前因。视情境为因偶发的机缘而生成的，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视情境为人们一连串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人类造成的社会事实，而不是自然的或神赋的，因而而不是不能改变的、永恒的、不可逆转的。

我非常认同学者提出的“新知识阶层的使命”的说法：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性变化，我们社会有了以知识本身为终极使命的社会阶层。作为知识人，无论是怎样的知识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同地方，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知识，必须要通过严格的专业的分工，深化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并且要记住知识的分工不过是便利我们的研究，我们还需要综合的心态，用一种非常广泛的知识视野来研究自然与社会。就像我们通过任何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一定会看到综合性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我们怎样投身于对社会事务的评论，都需要在知识人公认

的基础上立论；严格的知识论辩构成了我们知识人相互对话的前提。如果我们不讲知识、不讲证据，就变成喊口号的人。

这是新知识阶层的使命，也是“观察家”的使命。

（作者为《经济观察报》社长总编辑）

PART I

社会

肖知兴：我们这个时代的恶之花

肖知兴：游戏的精神

张维迎：语言腐败的危害

孙立平：重建公信力关键在机制

薛兆丰：管制造成的烦恼

薛兆丰：收入如何分配

陈志武：收入差距为什么在恶化？

我们这个时代的“恶之花”

肖知兴 / 文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多年前，我到西安某著名高校开会，学校安排车子送我去机场。大单位的司机中往往藏龙卧虎，有一些不凡之辈。途中司机对我打开了话匣子，讲起这些年他在单位里经历的种种不堪的丑陋之事，语气却颇为平静，难得的是他没有什么火气。后来，他告诉我，他信佛，每年冬天，他都要到终南山里的一个地方闭关修行一段时间。我感慨，在这么一个龌龊的环境里，难得你还能这样心平气和地信佛。他回答说：到处都是淤泥，难道不正好养我这朵莲花吗？

好一句“到处都是淤泥，正好养我这朵莲花”！我不禁为之拍膝而叹。把恶劣的环境变成有利的条件，化淤泥为营养，化糟粕为精华，化苦难为财富，这个时代，做人是这样，做企业难道不也是这样？

我在管理学课堂上讲“海底捞”案例，有人评论，海底捞公司工作非常辛苦，工资却不算高，有剥削甚至洗脑之嫌，属于“高温”或“高危”运行，恐怕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如此云云。首先，这个“高温”是他们自己的判断，真正高温不高温，其实只有员工自己知道，外人是无法置评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评论者以己度人，忘记了“海底捞”之所以成功的最基本与核心的逻辑：在一个实行歧视性的城乡二元机

制的国家，真正给中国最底层的年轻人提供了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想象一下，中国最边远、最贫穷的地区的年轻人，教育、商业等各种发展机会都微乎其微，几乎处于一种完全被这个社会所遗忘的状态。他们不甘自生自灭，铤而走险，只身来到大城市，被歧视，被凌辱，被忽视。有这么一家企业，居然把他们当平等的人来看，给他们尊严、信任、授权，而且待遇也还不错，更重要的是，做得好，可以从普通的服务员成长为店长、区长、经理，待遇、地位都绝不亚于那些平素对他们大呼小喝、颐指气使的“城里人”，他们岂不要一心一意、肝脑涂地去报答这家企业？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海底捞可谓是淤泥堆里长出一朵莲花，一朵代表底层人群对命运和体制不屈服的、骄傲而顽强的奇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恶之花”。“恶”是体制之恶，但海底捞这样的企业却以这样一种“城里人”们、大人物们难以预料的方式消解了这种体制之恶。从微观层面看，是创造了一家生机勃勃、利润滚滚的好企业；从宏观层面看，这种对旧体制的消解，弱化了城乡差距、贫富矛盾和劳资冲突，湿润了整个社会的空气，对我们整个社会的贡献又有多大？

中国巨大的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形成了一种三峡水库般的庞大心理势能，海底捞们（包括类似的企业如华为、顺丰等，做的其实是把社会层面的这个势能开发出来，转化成企业日常管理、日常运行的能量。他们可以说是用一种很阳光的方式赚了不正常、不公正的体制的钱，另外一些企业就未必有这么阳光了。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不用说，它们对旧体制与其说是一种消解，不如说是一种加强。权力部门从过去的单纯寻租，到如今为寻租而首先故意设租，就是这种加强机制的反应。还有一种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情况。例如，这些年在各大城市迅速发展起来的课外辅导行业。铁板一块的教育体制、以分数为本的应

试教育方针和教师收受红包的行业性腐败制造了对课外辅导的需求，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程度的巨大差距则为这个行业提供了供给：落后地区的教师宁可选择到发达地区做课外辅导，也不愿留守在老家做收入和地位都没有保障的教书匠。课外辅导行业一时如星火燎原，蔚然成为创投们趋之若鹜的一个新兴行业。可是这能长远吗？我们希望这个行业长远吗？

所以，企业要有战略，中国的企业尤其要有战略。可以像海底捞们一样，把体制的缺点变成自身的优点，但绝不能把自身的发展寄托在一种势必要淘汰的陈旧体制的基础之上。一方面是短视，将来迟早要承担被迫转向的代价，如果没有战略先手，转向不成，企业很容易土崩瓦解；另一方面是员工激励方面的成本。为一种势必要淘汰的陈旧的体制配套，为一栋势必要倒塌的大楼添砖加瓦，看不见自身工作在社会层面的意义和价值，怎能激励你的员工？只好重金用钱来砸。问题在于，“以利驱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仅仅用钱砸出来的员工，绝对不是最好的员工；纯粹的物质激励，绝对不可能激励出一个一流的团队。

其实，即使是海底捞们，也有处理好与这个体制的关系的问题。悲观一点看，如果中国现在这种体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不变，海底捞们继续从中国社会最“底”层“捞”人，当然可以照样像现在一样挣这个体制的钱，我们虽然无奈，但也乐见其成。乐观一点看（就算纯粹是为了逻辑推理的目的吧），当中国城乡差距越来越小的时候，海底捞们能够利用的前述的那种心理势能自然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必然要在管理文化的普世化和管理流程的更优化上面下大工夫，才有可能补足心理势能方面的亏空。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自然是希望乐观一点的逻辑能够早日成为现实。海底捞这样的企业，如果能与时俱进，到时还可能是大家

口口相传的一家好企业，但肯定不会是像今天这种亭亭玉立、鹤立鸡群的架势了。莲花不见了，淤泥塘也清理为一片平整的草坪甚至保育而成一片生机盎然的湿地了。你说，大家是应当为之感到高兴还是不高兴？

游戏的精神

肖知兴 / 文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对于“游戏”不同的态度，是观察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首先，游戏，所谓“game”，在西方的语境中，与之最靠近的是游戏规则，大家都按照一个共同的规则来公平竞争（fair play），才有所谓的游戏。所以，从运动，到行业，到政治，大家强调的都是游戏规则，必须严格按照游戏规则来做，游戏才有意思，才能一轮一轮地继续“玩”下去。既然是竞争，结果自然也重要，但比起游戏规则来说，结果是第二位的，甚至相当于是为游戏这个目的服务的手段了。所以，如果有人为了达到某种结果而不按游戏规则来玩，触犯规则，为了保护该种游戏的公信力和纯洁性，大家的意见自然是倾向于必须把犯规者罚下场。

中文“游戏”的涵义与英文有微妙的不同，重心在“戏”，在“玩”，玩笑的“玩”，玩世不恭的“玩”。既然是“玩”，游戏规则在这些人心目中并没有什么特殊重要的地位，如果目标是某种结果，是取胜，必要的话，玩弄玩弄那些游戏规则好像也未尝不可：本来就是一个游戏，那么较真干什么。而且，既然是“玩玩”，就没必要把这种游戏当成一种挑战自我、证明自我的终身事业来做，奖也拿了，名也出了，

哪里凉快哪呆着去，什么专业、敬业、职业，何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玩玩而已。

所以，在我们这个把“公平竞争”被翻译成“费厄泼赖”（又费又厄，又泼又赖，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堪的译名吗）的国度，就有了种种乍见令人困惑，实际又一以贯之的现象。金牌成了国家尊严和权力合法性的代表，所以，自然要不惜一切代价，经济代价不用说，举国体制牺牲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和职业也算不了什么，至于伪造年龄、私分奖金、球场变赌场等等玩弄规则于股掌之上的种种丑闻，也可以算是小节了。体育是这样，从各行各业到宏观社会政治层面，哪个领域又不是这样，在无往而不胜的权力面前，规则通通成了妓女，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可怜的游戏们被晾在一边嚎啕大哭。不知权力们想过没有，长此以往，游戏都死了，规则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下一步玩什么？

企业层面、管理层面的游戏规则，相对要乐观一些。道理很简单，老板要是没有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向他汇报的高层们很快看清他的真面目后作鸟兽散，企业自然就土崩瓦解，等不到老板把规则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时候。这里我想重点说的是，据我观察，企业层面的游戏要想玩得好，尤其是知识密集型企业，除了上述的规则精神和专业精神之外，员工还必须具有游戏精神的第三个维度，就是一种微微超然的、超脱的工作态度，英文叫“play — fulness”，不是玩世不恭，而是对自己工作的内容、自己所钻研的对象的一种悠然自得的玩赏态度。一方面是游戏本身全身心的投入，另一方面却是对游戏结果、对外在评价、对游戏之外的世界的一种相对的淡然。体育界一些天才级运动员，如石佛李昌镐、飞人乔丹、瓦尔德内尔等，往往都具有这样一种看似有点自相矛盾的职业态度。

例如，阿里巴巴的淘宝和支付宝公司，有一种很有趣的“花名文化”。员工在公司里日常使用的，不是自己的真名，而是来源于武侠